

誰能讓台文系擁有一部文學史： 我的懺夢錄

文／陳建忠

一、十年又十年，然後呢…

關於我與台文系所的淵源，應當要從上一個世紀末講起。當年我就讀的是清大中文系裡的現代文學組，而論文處理的宋澤萊與賴和則是被歸屬到中國現代文學裡頭的台灣作家。我的台灣文學理念受教於陳萬益、呂興昌、胡萬川、呂正惠、林瑞明諸位教授，這些老師如今已堪稱學院裡台灣文學研究第一代且是師祖級的人物。我進校馬上遇到的震撼，就是1994年第一個以台灣文學為名義舉辦的國際研討會：「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2001年畢業後的第一個工作在靜宜中文系（當時已有真理與成大設有台文系所），但教的還是台灣文學；隔幾年，就轉到靜宜新設的台灣文學系，爾後便輾轉校際以至於今。

這一段與台灣文學結緣的流水帳聽起來，其實遠不只十年，但重點是，我們還能繼續有機會談下一個十年嗎？即使有，那時候的台灣社會需要台文系所扮演什麼角色？我曾經發夢試圖要為這個台文系寫一部文學史的（也許我們同樣需要更多的文類史、思潮史…），但要等到第幾個十年我才會動筆呢？一個沒有教科書的系所，學生與社會大眾又要如何自我認同？

如果不想只當一個教書匠，而是一個教育工作者，一個以台灣文化永續發展為思考的知識分子，立足在學院裡我們似乎沒有逃避這問題的空間。

二、繁華與荒涼

根據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計畫」調查報告〉（2006）指出，當年所統計近五年內的中文學門熱門議題，「首推台灣文學之研究」。羅列出的數據有如：國科會計畫908筆中，台灣文學有74筆，佔8%；20種期刊論文計1079筆，與台灣文學有關為108筆，佔10%；326場學術研討中，與台灣文學有關者31場，約佔10%。這種情況若移至此時來看，台灣文學研究恐怕應當還是同樣的「榮景」。

不過，該報告也指出，雖研究議題具有多樣性，但台灣文學會成為熱門議題，原因與「現實政治環境及政府之積極推動有密切關係」。換言之，這種推測雖沒有調查數據指出政治力如何介入學術生產（事實上每個學科都不免和國家政策與資源分配有關），但其指涉不免還是「老印象」：台灣文學研究乃政治因素與政府推動下的產物，而並非學術界獨立自主發展出來的學科。

我們無暇去更正老印象，但既已成為熱門學科、熱門議題，如何讓這個學科建制具有完整知識體系，以便於教育與推廣，相信是更迫切的問題。換言之，如果在台灣內部，看待研究台灣的人，便幫我們套上政治的項圈；或者只將之視為民間的、次要的、鄉土的知識，而並非全國性的、首要的、根本性的知識，那麼，恐怕台灣文學研究不待國際競爭，就自然崩解於知識界的疏離與對立之中。沒有文學史，就無法有完整、一

貫的教材來授課，以致於人言言殊；台灣作家沒有文學史地位，台灣文學便自然被中國古典文學排擠，進不了幾百萬學子的視野之中。繁華背後的荒涼，該是我們要警惕的。

三、發夢與懺夢

想當年，為了不再寄居於中文系當中而在浩瀚無涯的「國學」之海裡被流放，也為了讓文學研究可以不受限於台灣特殊的「重古賤今」、「有中無台」的文化，台灣文學系被歷史推到前台。我們當然聽過各種質疑的聲音。但，所有提出質疑的人都忘了，事實上正是在統治者的思考下，為繼續完善其控制的絕對優勢，將特定意識型態賦形在文學體制上，進行日復一日的再生產與再鞏固。台灣傳統被視為次要乃至不重要，因此這不斷滑落在視野之外的台灣文學，遂不能成為文學教育裡所謂的傳統，其理甚明。

最重要的問題其實是，台灣的「文學」系所究竟能夠教育出什麼樣的文學人才？如今台灣文學系之成立，似應把焦點更放在「文學」上，除了台灣文學的專業外，不僅要學習中國文學，更要認識世界文學，因為他們都是「文學」這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員。只有兼具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能力，對世界文學史有所涉獵，出入於母語與漢文、古典與現代文學之間，這樣有台灣特色，又有世界視野的文學人才，才能在全球化時代以「台灣文學」做為商標，迎向廣闊的文學世界/世界文學。

不過，學科的特色與主體性，絕對是需要自己建構好才走得出去的。台灣文學系所，作為教育、推廣台灣文學的高等學院，迄今無法生產出體系完備的文學史教科書，應當是在那麼多熱門研究成果相對照下，格外令人感到難堪的事實。我們十多年的努力，如果不是作為堆疊出文學史的養分，而僅是一時的興盛，那終不免於土崩瓦解的命運。

我深怕，因為我只在研究所授課，漸漸會忘記這件更根本而迫切的夢想。如果我們受限於學術體制只求升等，而不合作來完成文學史，則恐怕在這惘惘的威脅正在擴大的時代，我想到了一樣也沒有本土學者寫的香港文學史，想到也許我們最後似乎可以不必再寫、寫之無關痛癢了！

回顧身為台文人的十年，不妨以這樣自我批判與反省的姿態，結束這篇個人的懺夢錄吧。✎

本文作者

陳建忠

清華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著有《台灣小說史論》（麥田，合著）等。

